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高全喜
编

贺麟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高全喜
编

贺麟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贺麟卷/高全喜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0-18782-2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贺麟 (1902—1992)-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4074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贺麟卷

高全喜 编

Heli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29 插页 3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9 000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贺麟像



1926年，贺麟毕业于清华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言——百年回头看贺麟

去年贺麟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恰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收录有一百多人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其中的《贺麟卷》，他们找到我，希望由我来予以编辑。作为贺先生的学生，我当然义不容辞，而且这这也是一个重新研读贺先生著述以及缅怀师生情谊的机会。大致用半年时间，我按照出版社的有关体例要求，并依据我对于贺麟思想要义的理解，编辑了这部《贺麟卷》。现一册在手，我掩卷思之，眼帘不禁浮现出贺先生慈祥宽厚的目光，那是一种“仁者”的形象。

我在《新京报》的长篇访谈中，曾经以“两个贺麟”为题，扼要地谈了我对于自己的博士导师贺麟先生的认识。现在《贺麟卷》要写一个导读，我将延续上述访谈的思路，把贺麟先生放在百年中国的语境中予以观照，我觉得要理解近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性人物，离不开他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尤其是百年巨变的中国社会。其实，这一想法与这套丛书的构思如合符节，例如这套丛书要求只收录作者 1949 年前的原版著述，且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就体现着思想人物与历史语境相互融贯的编辑意图。

大家都知道，百年中国经历着古今中西之变，1949 年以来，我们非但没有很好地延续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历史文脉，反而不断陷于决裂传统的革命激进主义社会改造和政治运动之深渊。现在的年轻人面对思想学术文化时，尤其在历史传承这一层面，或缺很多。虽然近年来，读书界有一个所谓的“民国热”，但各种媒体仍然流连于表面热闹，甚至带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很多人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耳熟能详，对其生平简历的一些八卦津津乐道，但都是浮于表层的认知。若要真正进入厚重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内在文理之中，则需要一个缓慢深入的了解过程。

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今天我们借着《贺麟卷》的出版来谈论他的学术思想。作为他的学生，亲炙他的教诲，我不禁自问：贺麟对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贺麟先生是卓越的黑格尔研究家，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西会通的典范，是学者，是导师，等等。但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或许都是外在的。我们更愿意透过这些，洞悉一个思想家的心灵，考辨思想家们是如何面对他的时代的。每每念及此，我不由得感慨万端。历史有时是诡秘的，黑格尔说，命运时常捉弄人，只有超越历史的时间之限，才会发现个人与时代无法摆脱的关联。对此，台湾学者黄克武在新近撰写的《贺麟的选择：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纪念文章中有发人深思的讨论。

从近现代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民国前后可谓是一个孕育思想学术的大好时代，内有古今之变，外有中西激荡，大时代提供大问题。常言国家不幸诗家幸，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贺麟前后的那一代学人，早年受蒙于传统，后大多留洋西方（包括日本），置身在中西文化的交会之地，而后又在从民国到抗战的动荡中发展自己的学术。这一切，使得他们拥有多元的知识体系与开阔的学术视野，并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社会建设这些大问题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处于这个大时代中的学人，大致前后五十年，他们拥有难得的内外造化，相当一部分人成就于此，彪炳学林，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胡适、冯友兰，等等，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经典著作面世，甚至有人还达到了所谓功、德、言之三立。不过，细致一点分析，这个学术思想谱系，又大致分为不同时期的三个学术群体。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康梁，其思想成熟于民国时期，抗战前其实已然完成其历史使命。第二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冯友兰，其思想成熟于抗战时期，1949年前已然完成各自思想体系的构建。第三个群体则是于民国初期受教育，发轫于抗战时期，若1949年后有一个正常、自由与稳定的社会环境，或许会产生更加丰富、宏阔的学术思想体系，贺麟先生就属于第三个群体。

贺麟先生的新儒学，在抗战时期已经初步孕成，他基本打通了德国的古典哲学与中国的儒学思想，甚至有所融会与开展，前景十分广阔。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学术进入另外一个思想轨道，贺麟等几乎所有旧时代的学者都被迫接受思想改造，此后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路线斗争冲击着他们，心灵所受的伤害远比肉体更为残酷，这不能不在相

当程度上窒息了他们的思想。1949年，天玄地黄，我们看到，有一小部分人到了港台或海外，他们中有些人天分资质及其思想厚度并不高于留在国内的众多学者，但现今我们回顾历史时，却使人有霄壤之叹。牟宗三、唐君毅是比贺麟晚半辈的学人，他们著作等身，义理完备，当然声名及其影响似乎远高于贺麟。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脉络中谈论贺麟，我愿意用“两个贺麟”来概述之。当今学术界对贺麟研究不多，一般是统而观之，所谓中西会通之总结，大多浮于表面。我所谓的两个贺麟，其分界时间即是1949年。其实，在研究梳理那一代学人的思想变迁以及精神状况时，这样的分界命题不仅可用于贺先生，亦可用于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概括而言，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抗战时期蔚然有成，孕育了强大的学术潜力，但历经曲折，道学绝绪，最终难尽全功。他们中个别人在改革开放后又回到前一个自我，接续起彼时的原创性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社会学家费孝通。但绝大多数人则是再也回不去了，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活出那个斯文扫地的苦难岁月。

作为贺麟先生的学生，想到先生一辈子的学术事业，感慨总是难免的，如果没有现代中国的政治之变，他的思想成就又会是何种面貌？故而走进贺麟的学术人生，我不得不明确地意识到，这里有两个贺麟，前一个是身处中西思想会通之际，拥有宏阔的学术视野并怀抱独创性的思想家，后一个则是黑格尔的研究专家和翻译家。

贺麟生于四川传统乡村的士绅家庭，少年时代，勤学刻苦，后进入清华预备班，对儒学、西学皆很感兴趣。他与张荫麟、陈铨被视为吴宓门下三大弟子，之后留学美国，受鲁一士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他喜欢黑格尔，喜欢斯宾诺莎，故而又去德国留学，随后回国即服膺于抗战时期的文化建国思潮。1931年甫归即写了一本小书，叫作《德国三大哲人葛德、黑格尔、费希德的爱国主义》（原书名叫《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贺麟对拿破仑入侵德国前后的那批哲人诗者多系同感，以其处境与中国当时相仿佛，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努力重建德国精神，贺麟将之引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且希望抗战亦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重要的是，贺麟把民族精神追溯到了中国的宋明理学，在他的《文化与人生》、《近代唯心论简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三本书中，基本理顺并阐述了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精神，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万

世开太平，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礼教诗教之化育，等等。他尤其强调精神的主体性，希望抗战能把古今中国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激发起来。他所谓的唯心主义，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心唯物，而是精神意志上的，是心灵信仰上的，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等思想中的精华，也正是如此。贺麟把德国唯心论与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继而发扬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找到了它们在精神上的同一性，隐然形成了中国现代新儒学中的“新心学”一脉。

新儒学是民国以来关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总体看法，其实有不同的内在学理。冯友兰做的是新理学，他在抗战期间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总称为“贞元六书”，他所强调的是格物致知的儒家理学传统。贺麟与此不同，强调的是心学这个谱系，关注的是陆王心学一脉的思想理路，在“智的直觉”中开启天地与社会之理。其实早在抗战期间，贺麟就隐然有了一个有别于冯友兰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理念，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把这些思考付诸于体系性著述，毕竟，贺先生的年龄及资历，比冯友兰要晚半辈。若假以时日，贺麟是能够创造出一个中国新心学的思想流派，足以与冯友兰一派的新理学相抗衡。即便如此，贺麟先生的几篇重要论文，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等，被学界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作，直到今天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家，都是绕不过去的。正如贺麟先生的一个学生张书城在《汇通集》中所言：“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他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想建树一种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理想唯心主义。但是正当这一体系‘筹建’的高潮时刻，新中国成立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成了永久性的‘未完成体’。”

我们知道，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有一个很缓慢的孕育过程，必须涵容广阔的社会内容。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虽有不同，但面临的任務却是相似的，宋明理学当时要消化的是佛学义理，试图把孔孟直至韩愈的儒学道统与佛学结合起来，建立理学。而民国以来，中国传统儒家面临的新任务则是消化吸收西学体用，尤其是西方的古典哲学，藉此建立自己的新儒学。

我们看到，冯友兰接纳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所以他构建了一个新理学，而贺麟接纳的是新黑格尔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相对而言，思想的厚度和思想的丰富性，比冯友兰所做的要求更高，任务更

巨。贺麟虽然尚未构建出一套自己的“新心学”体系，但毕竟已有学术气象，且初具规模。假如1949年之后社会政治稳定，法制昌明，贺麟或许可以慢慢孕育生成自己的“新心学”思想体系。但事实是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他面临的不再是继续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前行，而是接受思想改造，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样，贺麟就进入到他的另一种人生，也就是我所谓的第二个贺麟。

置身度外去看历史，有时你会觉得别有一番意味。由于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贺麟的唯心哲学自然无法发扬光大，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官方承认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故而，黑格尔哲学是被允许翻译与研究的。所以第二个贺麟，就不再是那个会通中西发展新心学的贺麟，而是一个以学者身份进行黑格尔翻译与研究的贺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麟辛勤介绍德国古典哲学，无论在翻译上，还是在研究上，都达到了其所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要知道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环境。应该指出，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一些重要名词、概念、范畴，比如有无、对立、统一、差异、扬弃，等等，都是从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哲学中提炼出来，并成为哲学爱好者们所共享的专业术语。贺麟的翻译，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学术建设的基本工程。翻译讲究信、达、雅，贺麟翻译的《小逻辑》，洗练、简洁，是西学翻译的经典性作品，可以说，他把从前的哲学研究转化为对翻译的痴迷，虽然他的新儒学发凡已断，但他的学术之志寄托在翻译之中，就像沈从文不写小说而去研究古代服饰，吴恩裕离开政治学专治《红楼梦》，这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后来者只有穿越百年的孤独才能体察。

在纪念贺麟的文章里，我们能发现大家对贺麟的印象基本都是谦虚严谨、笃厚朴实，断非趋炎附势、曲学阿世之辈。也正是如此，人们对贺麟的一些言行就难以理解，比如公开赞同唯物论，批评唯心论，激烈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以及晚年入党，被称是“历经坎坷找到光明的归宿”。依据现今人的想法，思想高明者似乎当固守气节，以义命自持，对权力保持明确的距离。如何看待贺麟先生的那些事呢？德国哲学家中，恩格斯就评价说，歌德与贝多芬相比，黑格尔与费希特相比，前者都有一个庸人的辫子。有个故事说的是歌德与贝多芬在街上聊谈，恰巧一位王公经过，歌德主动让路，还向王公离去的背影鞠躬，贝多芬就不以为然。还有席勒，相比之与歌德，他是非常执着

地批评王权专制的。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歌德就比席勒差劲，黑格尔就不如费希特高尚。从某种意义上说，贺麟肯定不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超凡绝俗的魅力型学者，他对于世俗权力，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或许留有歌德、黑格尔式的小辫子吧。但是，作为思想立场，贺麟并不糊涂，他在《文化与人生》（1946年）一书谈论学术的文章中，就认为学术必须独立，决不能成为政治的依附物，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与尊严，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

这样一来，对于贺麟而言，在服从已然存在的政权之道，与他自己表述的学术独立之间，就难免有两难的困境。对此，我觉得还是要百年回头看贺麟。应该承认，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儒家，还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对政权基本上都是趋于认同的，贺麟浸濡其中，难免不受影响，他确实是缺乏对于强权的抗拒意识。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他不仅写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写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他曾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当教导长，赞同蒋介石当时鼓吹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接见过他三次，毛泽东接见过他一次。贺麟先生对于政权的态度，其实是很传统、很古典的。对此，我曾很有疑惑，后来随着岁月流逝，我大体想通了，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此可以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理解。任何一个政权能够执掌天下，必然有其内在的道理，人们可以不赞同其说辞，但时代精神毕竟曾经流连于此，至于合理的就一定会存在，则是另外一个逻辑了，时代精神已经离它而去，那它就要重新更化。我想贺麟认同的与其说是政权的事功，不如说是其背后的天命。但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天命流转，精神不辍，这就是历史的命运，谁也逃不过。

至于具体说到他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我认为，一方面有政治环境的因素，当时的情况显然是人人必须表态才能过关；另一方面也还是有学理层面的考量。胡适倡导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理路是存在差异的。各种思想的竞争在百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中一直赓续不断，在思想层面上，他们当然有相互争鸣的可能性，只不过在大陆争鸣歧变为批判，我想这并非贺麟的初衷。在为人、为学上，贺麟都称得上中国传统的道德君子，宽厚温情、儒雅中庸，特殊时代加于人间的痛苦，他也都一一承受，从未转嫁于他人。他对于学术独立的向往，体现着贺麟终其一生对思想自由的认信，但学术是学术的，政治是政治的。他基本上是书斋式学者，希望以小我融入外部的大社会，实际上则